

为将就要保家国

■章熙建

1955年国庆前夕，北京中南海怀仁堂，新中国举行第一次授衔仪式。大国战将，威武列阵。

百年征程，一路辉煌。战争年代，英雄战将出生入死、浴血奋战，为打败日本侵略者、推翻蒋家王朝建立了不朽功勋。平时时期，在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多条战线上，在保家卫国的使命任务中，冲锋在前的战将赢得人们崇高敬意。

三军之重，莫过于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将干什么？为将怎么干？

习主席给出了答案：“我们一定要时刻以党和人民为念，以国家主权、安全、领土完整为念，以国防和军队建设为念，夙夜在公，恪尽职守，全力做好工作，决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决不辜负全军广大官兵的期望。”辉煌犹可追，征程更迢迢。新时代呼唤为将者书写新的答卷。

“夫将者，国之辅也。辅周则国必强，辅陋则国必弱。”

走进历史深处，春秋时期的一次军事变革，带我们触碰到“将军”这一军队职衔的源头。

《国语·晋语四》记载：“乃大蒐于被庐，作三军。使郤穀将中军，以为大政，郤溱佐之。”其意是，在被庐（晋国地名）举行阅兵演习，任命郤穀为中军将，总揽军政大权；郤溱任军佐，辅佐之。

这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第一次把“将军”作为常设职位的记载。当时，对于大战前的晋国而言，整编军队，设立上、中、下三军制，并编制将、佐职衔，成为增强国家实力的关键之举。

由此可见，“将”者，“统领”之意也；“军”，指的就是军队，“将军”这个称谓，顾名思义，即“统领一军”之意，是带兵打仗的人。

战国时期，随着战争越来越频繁，军队规模越来越大，将、佐职衔被作为军队常设编制，逐渐固化并沿袭下来。后来，步兵、骑兵、水师等逐步细化，于是，又出现了驃骑将军、车骑将军、卫将军等职衔。

从春秋时代“统领一军”，到战国以后的正式官职；从单一步军、马军将、佐，到现代的诸军兵种将军，“将军”这个称谓，走过2000多年的历程。

在漫长的战争历史中，一首首以将、佐为主体的边塞诗应运而生——“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忆李将军”……

毋庸置疑，“将军”不仅仅体现着权力和荣耀，更是责任和担当的象征。身居“将”位，意味着肩负保家卫国重任，驰骋战场，奋勇杀敌，职所系也。

岳飞、戚继光、李广、卫青、霍去病……中华民族历史长河中，将星璀璨。古代战将之所以让后世景仰，不止于他们的领军之才、赫赫之功，更在于他们爱国御敌的民族气节、卫国护民的铁血担当。

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来说，革命将领的“为将观”，不仅包含了中国古代战将保国安民的文化精髓，而且富有更高的精神层次和思想境界。

二

古代兵书《尉缭子》中有“三忘”精神，至今仍有广泛影响：“将受命之日忘其家，张军宿野忘其亲，援袍而鼓忘其身。”

这种“忘”，不仅是一种责任、一种使命，更是一种信念、一种境界。作为将领，就要比任何人更加信念坚定，为保家国、保人民可以倾其所有。

陈树湘，习主席多次提及的英雄，一位“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的将领。

湘江战役中，时任红34师师长陈树湘，临危受命，率数千名官兵执行阻击敌人追兵的任务。在完成掩护中央红军主力抢渡湘江的艰巨任务后，陈树湘率部突围时腹部中弹，在激战中不幸被俘。

敌人企图通过陈树湘获取中央红军情报。面对威逼利诱，陈树湘立场坚定，绝食拒医。在敌人用担架抬着他去邀功的途中，陈树湘毅然撕开腹部伤口绷带，忍着剧痛从伤口处掏出肠子，用力绞断……他牺牲时，年仅29岁。

断肠明志，巍然如山。2021年4月25日，习主席来到位于广西全州的路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在油画《陈树湘》前，习主席停下脚步，凝视良久：“壮烈啊！陈树湘是牺牲英雄中很典型的一个。”

巍巍太行，见证了我军另一位高级将领的英勇壮烈。

1942年5月，日寇对我太行抗日根据地发动大规模“扫荡”。时任八路军副参谋长的左权，在指挥部掩护总部及北方局机关转移时，遭日军伏击牺牲，年仅37岁。

左权之女左太北，始终难以忘记彭德怀元帅对她说过的一段话：“你爸爸一定知道，那次敌人打的第一发炮弹是试探性的，第二颗炮弹准会跟着来，躲避一下还是来得及的。你可你爸爸为什么没有躲避呢？要知道，当时的十字岭上正集合着无数的同志和马匹，你爸爸不可能丢下部下，自己先冲出去。他是死于自己的职守，死于自己的岗位，死于对革命队伍的无限忠诚。”

生的希望让给战友，死的危险留给自己。左权明知危险就在头顶，但绝不后退一步。他用忠诚和鲜血，换来了总部重要岗位骨干的突围，舍身保护八路军指挥中枢。

“名将以身殉国家，愿拼热血卫吾华。”这是朱德为左权所作的悼念诗，也是一代革命战将的生动写照。

1944年9月青浮战役中，时任八路军第386旅20团团长楚大明腹部中弹，血流如注，却仍坚守阵地指挥战斗，直至全歼守敌。战后，太岳军区授予他“特等战斗英雄”称号。

楚大明作战勇敢，素有“猛虎团长”之称。1947年1月，晋冀鲁豫军区第4纵队第10旅协同第11旅等部，将敌两个师包围于中街村一带。敌人困兽犹斗，第10旅3个团围攻屡挫、伤亡较大。时任第10旅副旅长楚大明，腹部还缠着绷带，却执意要上前沿。他甩掉大衣，喊了一声：“我就不信攻不下！跟我来！”激战中，楚大明被敌人弹击中胸部，不幸壮烈牺牲。

楚大明牺牲后，晋冀鲁豫军区授予他“特等战斗英雄”称号。一人被

两次授予“特等战斗英雄”称号，在我军军史上并不多见。楚大明出殡之日，陈廉挥泪写下挽联：“太岳战将勇，首推楚大明。”

“弃身锋刃端，性命安可怀？”作战中，楚大明先后20余次负伤。那句“把命豁出去”的口头禅，成为他一心向党、以身许国的光辉注解。

习主席在全军高级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强调：“我党我军是用理想信念凝聚起来的，加入这个党、这支军队，就要笃信马克思主义，就要忠诚于党的信仰、党的组织、党的事业。”

人民军队的百战百胜，以无数先烈们的鲜血铸成。作为将领，更须率先垂范，视死如归、向死而生，为党和人民奉献自己的一切。

三

习主席深刻指出，军队是一个战斗队，是为打仗而存在的。人民军队的高级将领肩负着保家卫国的千钧重任，唯有把使命扛在肩上，做到夙兴夜寐潜心谋打仗，枕戈待旦矢志打仗，才能不负党的信任、人民重托，真正成为国之栋梁。

开国大将粟裕终生不会打牌下棋，不会唱歌跳舞，最大的爱好是看地图，最大的追求是尚武精武，最向往的地方是铁血战场。

粟裕一辈子都以军人的眼光审视、分析、判断眼前的世界。解放后，别人在繁华大街逛商店，他却在那琢磨如果打起仗来，这个街区怎样攻占，那个要点如何固守。别人眼里的山川光景，在他眼中都是曾经和未来的战场。

回顾粟裕的征战历程，以少胜多、以弱博强的战例有很多。可这样一位“常胜将军”在回顾当年辉煌经历时，多次写下“担子沉重”“心情紧张”等内容。他在忆及当年黄桥决战前的心情时说：“成败的责任完全在我们，在敌众我寡的条件下，肩上的担子是很沉重的。”谈到宿北战役时，他说：“我协助陈毅同志指挥宿北战役深感责任重大，心情紧张。”这样的记载，真实反映了粟裕对待每一次作战都精益求精的可贵品格。

两军对阵，不仅是兵力、火力、士气的较量，也是双方指挥员谋略水平和指挥艺术的较量。在一定情况下，胜负往往取决于指挥员的一念之间，担子不可谓不沉重，压力不可谓不大。战争年代，我军的革命将领始终对党的事业高度负责、对用兵打仗极其谨慎。正是因为他们带着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潜心研究战争客观规律，才造就了他们高超的指挥艺术。

开国上将韩先楚，被人称为“旋风司令”。这个称号是敌人送给他的。1947年9月，韩先楚调任东北民主联军第3纵队司令员后，第一个任务就是开展秋季攻势，歼敌威远堡至西丰间的第53军116师。

纵队原作战方案是首先歼灭西丰之敌，然后向纵深扩大战果，但韩先楚主张直接攻打威远堡，一方面威远堡是敌人的脑袋和心脏，守军只有一个营，是敌弱点，攻打这里出敌不意；另一方面，我军可半路伏击来援之敌。

会上，有人说这个方案过于冒险，韩先楚却说，在东北战场大量歼敌、震慑敌人，是上级赋予的任务；方案的稳与险之争，其实是完成任务的决心大小之别。

最终，上级批准了韩先楚的这步险棋。9月29日，纵队各部强行军100多公里，于10月1日拂晓前进入攻击和阻援地域。随着韩先楚一声令下，主力向威远堡发起进攻。回援的敌军也遭我援部队伏击，损失惨重，敌第116师师长刘润川被俘。纵队成功地完成了奇袭威远堡的壮举，创造了堪称“以奇制胜”的典范。

此役震惊敌营。国民党东北行辕主任陈诚在日记中写道：“韩部行踪如魅，今日占鞍山、明展现营口，真旋风也。”

战友们评价韩先楚，“灵活运用我军传统战略战术，不拘一格地创造新的打法”。而他的那些出奇制胜背后，是细致扎实的战场研判、千思万虑的部署推演。

“战争离我们并不遥远”，这是“导弹司令”杨业功经常说的一句话。

为了建设共和国“战略铁拳”，杨业功像拧紧的发条一样奔忙在岗位上：“军事斗争准备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必须珍惜比金子还珍贵的分分秒秒！”

2004年7月1日，杨业功病情急剧恶化。妻子期望丈夫能亲口交代一下后事，可他临终时嘴里念叨的依然是“操作”“出发”……

一年后，“感动中国”组委会给杨业功致颁奖辞：“他用尺子丈量自己的工作，用秒表计算自己的生命。未曾请缨提旅，已是鞠躬尽瘁……”

“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之。”当今，尖端科技突飞猛进，作战形态发生深刻变化，备战谋战的内涵随之而变。领军之将必须勇立军事变革前沿，紧盯科技之变、战争之变、对手之变，钻研现代战争机理，锤炼克敌制胜硬功，才能做到始终胜券在握。

四

习主席强调：“职位越高越要自觉按照党提出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越要以坚强党性和高尚品格，为全党带好头、作表率。”

初心皎皎，终身清澈。我军革命将领身上的“无我”境界，闪耀出共产党人纯洁党性的光芒。

“在中国革命的事业中，我究竟为党为人民做了些什么？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实事求是地说，是微不足道的……现在我诚恳、慎重地向主席、各位副主席申请：授我上将衔。另授功勋卓著者以大将！”

这是1955年授衔仪式前，战将许光达向毛泽东同志和中央军委写去降衔申请书中的一段话。

毛泽东看到许光达的降衔申请书后说：“这是一面镜子，一面共产党员毫不为己、不谋私利的镜子！他将始终成为我党、我军上下一面很好的镜子！”

将魂，不是肩上的将星，是心中的风骨。

1950年初，党中央决定提前进军西藏。时任第18军军长张国华原本带领部队接管富庶的川南，却在上任途中接到命令，要他赶赴重庆受领最新任务。

见到张国华，邓小平第一句话便开门见山：“今天谈话凭党性。”张国华答：“一切听从党安排。”邓小平说：“你指挥部队去西藏。”张国华答：“坚决完成任务！”

进军西藏，千难万险，张国华何尝

不知？但他想的是党的决定、军人的使命。誓师大会上，张国华把3岁的女儿艰难带上主席台，面向全军官兵宣布：“不但我要进藏，我老婆要进藏，就是我女儿，也不留内地，也要跟我一道进军西藏。”艰难最终夭折在进藏路上，成为第18军年龄最小的“烈士”。

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张国华在西藏一待就是17年。从完成西藏和平解放、粉碎帝国主义支持的“西藏独立”图谋，到废除封建农奴制、结束西藏长期“有边无防”状态，再到在极端高寒缺氧条件下，建成总长达4000余公里的川藏、青藏公路，打破西藏千年封闭交通格局，第18军叫响“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口号，用满腔热血践行“到藏区去为人民服务”的誓言。

因长期征战高原地区，张国华落下高血压、冠心病、支气管炎等病症。1972年2月20日，张国华突发心脏病倒在会场上，次日与世长辞，年仅58岁。

肩上千钧重担，身后千军万马。战将的无私担当，光昭日月！

1947年，国民党军攻占延安，蒋介石走进抗日军政大学旧址。举目四望，窑洞简陋，一件像样的教具都没有。他问出了心中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我党的黄埔军校和中央军校的条件比这里强十倍、万倍，为什么会打仗的人却越来越少了呢？”

在此之前，一场战斗结束后，我军指战员惊讶地发现，敌人仓促掩埋尸体的一条壕沟里，堆积着大量的金条、手表和其他贵重物品。这些物品，是敌军指挥官的私人财物。蒋介石怎么也想不到，两军鏖战的生死存亡之际，他的部下们居然还随身携带割来的不义之财。

一方是为私利所驱，腰缠万贯；一方是为家国而战，一腔赤诚。狭路相逢，高下立判。

殷鉴不远，振聋发聩。

习主席在全军高级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强调：“我们党是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没有任何自己的特殊利益，一切谋私贪腐的思想和行为都同党的性质宗旨格格不入。”

无论战争年代，还是平时时期，其境有异，其理相通。人民军队永远需要无私无畏的将才，永远呼唤把人民的利益和安全高高举过头顶的将领。

五

胜战之恒，唯其远谋。

我军革命将领，功勋卓著。战争年代，他们为保家国浴血奋斗，立下赫赫功勋；进入平时时期，他们以深邃的战略眼光紧盯未来战场，预事在前，未雨绸缪。他们创下的不朽业绩，为我国国防现代化建设抢占了先机，奠定了重要基础。

1950年，中央军委决定，创办一所适应现代战争条件的正规军事院校，教育训练中级干部。时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第二野战军司令员的刘伯承得知后，立即给党中央写信，提出：“要建设一支现代化的军队，最难的是干部的培养，而培养干部最难的又是高级干部的培养。我愿意辞去在西南担任的一切行政长官的职务，去办一所军事学校。”

然而，挑战如山横亘：苏联专家不熟悉中国国情，野战军将领善战却理论匮乏……这时，刘伯承看到一份战

犯名单，目光聚集在“廖耀湘”3个字上。廖耀湘受过法国圣西尔军校的正规军事教育，曾随中国远征军在缅甸野人山作战，歼灭大量日军。刘伯承决定，请这位曾与自己在解放战场上兵戎相见的对手，给学员上军事课。

打败仗的怎能教打胜仗的？消息传出，学员们议论纷纷。刘伯承说：“毛主席说过，革命不分早晚，不计先后，站到革命队伍中的就是志同道合的同志……他们积极为我们传授军事科学和文化知识，就是我们的老师。”

廖耀湘接到通知后也是诚惶诚恐，连连摆手。刘伯承对他说：“这次，请你来当我们的老师，主要讲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讲讲你在缅甸抗日取得一定成绩的‘小分队战术’‘森林作战法’及‘城镇村落战斗’；二是讲讲你对我军建设的建议。”最后，刘伯承坦诚表示：“这三方面的问题，只有你能讲，我们只能当你的学生。”

建院初期，调到军事学院任教的原国民党军官达600人，约占当时教员总数的70%。刘伯承对我军正规化建设的战略审视，突破胜败荣辱羁绊，凝目于对军事真理的求索上。到他1957年卸任时，这所军事院校为新中国培养了3000多名优秀军事干部。

从指挥打倒敌人打仗，刘伯承战略考量的标尺，紧紧卡在“变一将之制胜，为千百将之胜仗”上。

新中国成立之初，朝鲜战争爆发。西方列强肆意推行核垄断、核威慑和核讹诈。1956年3月，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审时度势，决定研制导弹、原子弹。

聂荣臻临危受命，数十万大军挥师戈壁，邓稼先、于敏等精英人才隐身大漠。新中国规模空前、高度综合的国防科技重大项目悄然展开。

到了上世纪60年代初，国内经济面临严重困难，有些人认为“两弹”困难太大，主张“下马”。聂荣臻寸步不让，力主继续研制“两弹”：“一退就会落后，一落后就是几十年，将来我们的后代会骂我们的。”“搞不出‘两弹’，我死不瞑目！”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自行研制的原子弹爆炸成功。对此，一些西方国家嘲笑中国是“有弹无枪”，断言中国5年内不会有运载工具。

他们先算了。其实，聂荣臻早就运筹在先，几年前即已部署中近程和中程地地导弹研制攻坚。1966年10月27日，聂荣臻坐镇酒泉发射基地。随着指挥员一声令下，装载着核弹头的“东风二号甲”导弹直冲云霄。几分钟后，罗布泊升起“蘑菇云”，中国自此拥有了导弹核武器。

西方列强愕然，国人为之雀跃。

“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习主席明确要求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尤其是高级领导干部要主动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的滋养，不断提升战略思维和辩证思维能力，强调“更加注重从全局和战略层面谋划党和国家工作”“制定各方面决策部署，首先要有正确大局观，站在党和国家大局上想问题、看问题”。

为将贵重如山。“风云起乃期猛士，鼙鼓动而思良将。”奋斗建军百年、奋进强军一流，使命召唤为将者担起强军重任，昂首行进在钢铁方阵的排头，随时准备亮剑于未来战场的高地。